

英国新工党政府 与志愿组织的合同合作^{*}

周真真

内容提要 如何解决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困境是英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1998年,英国新工党政府与志愿组织代表签署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这意味着官方与民间的合同合作方式在英国首次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这是新工党社会服务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工党政府不再仅仅将志愿组织看作是为其提供服务的工具,而是要承认其政治地位,以赋予市民社会新活力,并通过重新恢复活力的市民社会,为福利制度创造能够良好运行的国内环境。

关键词 英国 志愿组织 合同合作 市民社会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0.03.029

1998年11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和全英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委员会主席肯内斯·斯通共同签署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The Co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与志愿组织间的合作协议,随后英国还签署了地方COMPACT——《地方各级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自此,合同合作,即政府与志愿组织签订合同,政府出资、志愿组织提供服务,逐渐成为双方合作的主流形式。这一合作,既不同于1945年后政府对志愿组织的忽视,也不同于1979年后保守党对志愿组织的市场化利用,它将志愿组织纳入政府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并与政府平起平坐,从而成为英国史上的一种全新现象。本文依据《泰晤士报》、有关合同合作的政府文件等一手资料,从史学角度对英国新工党政府与志愿组织的合同合作进行新的解读。

合同合作的缘起

英国在二战后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制度,以消除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社会问题,概括来说,它有三个明显特点:(1)它面向所有公民,是一种普遍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2)享受福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无需承担任何损失。(3)这种消费型的福利模式,通过为公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水平,来达到减少贫困并最终消灭贫困的目的。^②然而至20世纪70年代,福利制度最终让英国不堪重负。一方面,为了赢得选举,各政党竞相扩大福利的范围,社会保障支出的持续增加使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福利制度还使政府必须负担高额的行政费用,效率上的拖沓和官僚主义习气也随之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更重要的是,福利服务的过度膨胀还破坏了市民社会的活力。因此,英国福利制度面临着必须改革的要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项目号:16ZDA141)的阶段性成果。

1979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将改革重点放在了直接削减福利开支上,希望通过回归传统的自由竞争重新激活英国经济。保守党政府努力降低公共支出、扩大私人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影响力并开始更多地利用民间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通过“救济代理中心”将社会福利导向市场。改革虽然在初期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从1980年的18.1%下降到1988年的4.4%,同期经济增长率达到3.8%,超过欧共体3.5%的增长速度,但是80年代末保守党的政策开始失效,1990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不足1%。^③改革亦没能抑制福利开支的增长,反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更为突出。

削减福利开支并不是解决困境的长远之计。英国该向何处去?1997年新工党上台后,“赋权公民”就被明确提出。它在福利改革上声称,要建立社会投资国家,即社会支出将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使“应负责的危险索取者”变成良好市民,变以往的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④新工党希望重唤公民的参与热情,通过积极发挥市民社会的价值,建立一个由各种组织、机构和团体共同参与的福利社会。

志愿组织是提高公民参与度不可或缺的力量。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分析家托克维尔就明确表述了社团组织作为个体公民与国家间“协调机构”的思想。他将志愿主义看作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市民组织和政治性组织间一种自然和必要的联系,公民以此联合起来影响国家。^⑤志愿组织作为公民独立开展个人和社区活动的载体,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公民权和市民参与的角色,而且构成了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工党认为,政府和志愿机构的合作对构建现代福利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新工党政府重新定位了政府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将志愿部门看作是解决公共部门弱势和缺陷的一种途径,其改革的最大突破是不再将志愿组织看作是执行服务的代理人,而是给予了志愿组织应有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政府的政策商讨者。至于如何实现政府与志愿组织的合作、采取何种形式,则与志愿组织的努力密不可分。

志愿组织历来重视与政府的合作,政府资助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志愿组织对自身管理的发展需求,也促进了它向政府的靠拢。志愿组织发展的复杂多样,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总体指导机构,英格兰社会服务联合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便于1919年应运而生,并在1980年更名为志愿组织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za-

tions,简称NCVO)。它发挥着英格兰志愿组织“代言人”的角色。然而,这类全国性组织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机构也不拥有法律效力,其协调角色受到很大限制,从而使政府对志愿组织的引导显得必不可少。此外,随着政府与民众对志愿组织在居家照护、健康服务、儿童和老人照顾等需求的增多,对志愿组织的专业管理需求也相应增加,加强对志愿组织使命、角色与责任的管理,业已成为政府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于是,如何实现与政府的有效互动是志愿组织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95年NCVO发起了一项前瞻性的研究计划,对英国志愿部门在21世纪的发展做出展望,并聘请志愿部门享有声望的尼古拉斯·迪金教授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在历时一年通过对各类志愿部门、地方政府、专家以及部分公民进行广泛调查后,出版了题为《迎接挑战——21世纪的志愿行动》的报告,一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关慈善机构定义和规章制度的改变,另一方面提出政府和志愿部门应该商讨一个协定,以囊括双方的关系、权利和义务,^⑥即建议政府与志愿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就未来关系的基本原则出台正式协议。该建议成为COMPACT的雏形。为此,NCVO还号召组建了一个COMPACT工作小组,代表志愿组织与政府进行协商,并于1997年12月至1998年2月向全英志愿组织征求意见;超过2.5万家志愿机构对COMPACT做出了积极回应。该报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志愿组织的政治地位提出了要求,即,双方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志愿组织在相应的社会政策上应享有合理的发言权。这一思想既摆脱了保守党政府对志愿组织的工具性利用思想,又融合了活跃于政府内外不同类型志愿组织的要求,为政府和志愿组织间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有效实现方式。

全方位的福利制度对公民责任的忽视使英国负重累累,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对政府责任的推卸又带来了市民社会的伤害。新工党希望通过与志愿组织的合作寻求政府责任与公民责任的平衡发展,以实现市民社会的更新,这符合英国的现实需要,而志愿组织基于自身需要提出的发展计划恰与新工党政府的改革理念不谋而合。这是双方战略性选择的结果,只是政府在选择的确立和实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合同合作的实现

新工党的上台最终让理想变成现实,1998年COMPACT作为国家政策正式出台。它阐述了双方关系的价值和原则,其中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原则:政府对志愿部

门的资金支持原则;政府确保志愿部门的独立性原则;双方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协商、协作原则;志愿部门在使用政府资金等公共资源上的公开性、透明性原则;政府保障不同类型的志愿组织公平获得政府资助的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合同^⑦通常由一份以上的文件或者一个以上的协定组成。尽管其形式各地有所不同,但是,合同一般包括参与者达成协议的要约、双方共同的目标和理念、详细的执行协定等。大部分情况下,合同签订后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由来自政府和志愿部门的代表组成的合同发展小组,第二步是收集各方观点,第三步是制定执行计划。^⑧在此过程中,政府又通过培养志愿组织的合作能力、提供资助等方式保障 COMPACT 的顺利实现。

1. 培养志愿组织的合作能力

创新型的合作方式需要创新型的支持体系的存在,为此政府首先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计划,即“建设者”计划——包括未来建设者、能力建设者和社区建设者^⑨。其中价值 1.25 亿英镑的“未来建设者”计划尤为重要,其目的主要有三点:(1) 提高政府支持志愿部门发展的能力。从 2003 年到 2006 年,内政部额外划拨了 9300 万英镑用于提高政府对志愿部门的基础性支持。2003 年,内政部又通过建立社区理事会,加强了自身支持志愿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2) 激励志愿和社区组织的发展。其关键是战略小组的创建。战略小组处理一切关于慈善管理的事务,如,市场中的慈善行为、慈善机构的产生及其资源的使用、任务的执行情况、慈善机构委托人的招募和报酬、慈善委员会的改革等。(3) 建设志愿和社区部门的组织能力以使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⑩通过培育、宣传和扩散志愿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创新,明确促进了志愿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

在地方层面上,合作几乎覆盖了地方政府与志愿组织交涉的所有领域,地方当局通过提供战略性概览,为单个创新行为确立优越的环境。为了确保志愿和社区部门的代表性,邻里革新小组已经提供了 3600 万英镑在 88 个邻里革新基金地区建立了社区网络^⑪,为地方各组织建立起了它们的活动基地,从而有力增强了志愿组织参与合作的能力。

围绕着合同合作存在的一些问题,2002 年政府还建立了英格兰合同咨询服务处(English Compact Advisory Service)。信息的不流通和缺乏是妨碍志愿组织发展以及影响合同合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政府投资了 290 万英镑在 2005 年 11 月开启了“英国向导之星”(Guidestar

UK) 计划。该计划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有关慈善机构及其相关的任务、计划、目标和成就等的财务数据库,公众和慈善机构可以自由访问其信息。政府希望以此促进捐赠行为的合理化,提升慈善机构对公众的负责,从而进一步规范慈善机构的发展和运行。

2. 为志愿组织提供合同资助

新工党执政期间,政府对志愿部门的花费从 1997 年开始增加了一倍,到 2009 年已达每年 110 亿英镑。^⑫政府还将每年博彩业收益的 16.7% 通过政府基金分配给全国各类慈善组织,并设立面向公益活动的财政部专项资金。^⑬不过,政府向志愿组织提供的直接资金授予和合同资助间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合同资助正在替代传统的现金资助。NCVO 在 2009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07 至 2008 年度志愿组织来自政府的收入是 120 亿英镑,其中现金资助是 42 亿英镑,而合同资助高达 78 亿英镑。^⑭

政府与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的合作鲜明地体现了上述变化。一方面,双方的合同项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协会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获得的资助越来越多。NSPCC 的运作虽然一直依赖志愿捐赠,但从下表可以看出:协会从政府中获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9.55%,上升到 2005 年的 12.94%。这部分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合同收入,直接的现金资助很少且有不稳定性。大量的合同资助有效地帮助志愿组织扩展了活动范围,增强了社会活力。

2000 年至 2005 年 NSPCC 所获政府资助统计表^⑮

项目门类 (单位:千英镑)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与法定机构签订的服务合同收入	4164	4570	5531	8150	10379	12184
服务合同下获得的捐赠服务价值	1533	1260	1459	1138	1059	757
现金资助和一次性酬金	2082	2938	2556	1432	937	1490
所获政府资助总额	7779	8768	9546	10720	12375	14431
政府资助占 NSPCC 总收入的比例	9.46%	9.55%	10.54%	10.69%	11.80%	12.94%

3. 吸纳志愿组织参与合同的制定、管理和评估

新工党政府支持和引导志愿组织发展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受尊重的、能够代表大部分志愿组织的代理机构的发展。NCVO 在英格兰便发挥了这一作用。政府在任何重大的政策形成之前都须咨询 NCVO 以及相关的企业团体;这是由 1998 年确立的 COMPACT 机制所决定的,否则任何政策将不可能在议会获得通过。另外,NCVO 还主动分析新政策对会员机构的影响,指导会员机构采取应对措施;对志愿和社区组织的未来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并

于2007年通过了一个为期四年的战略商业计划,对价值、积极参与型公民、关系、治理和资源等五个战略主题做了论证,涉及17个战略目标。^{①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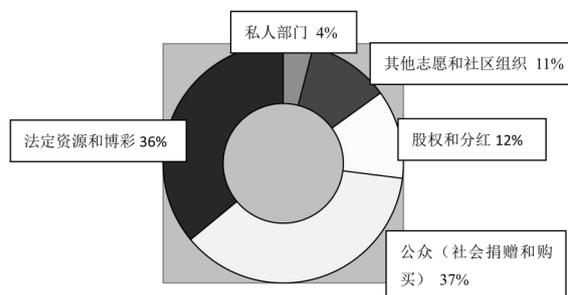
志愿组织还参与合同的管理和评估。政府不断完善对合同的内部管理,以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为此双方共同制定了四个行为守则,涵盖了资助、咨询、黑人和少数民族组织,以及志愿活动,用于指导有关合同执行的细节。每个行为守则都囊括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责;志愿部门的职责;以及双方共同的事业,即,鼓励和支持志愿行为。志愿组织与政府还组织联合论坛,每年至少见面三次,讨论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关注的问题。在合同合作的实现过程中,政府有意识地将志愿组织融入了政府工作的一切方面,从合同的构建到合同资金的申请,再到合同的实施以及最后的评估,志愿组织都享有与政府平等对话的权利,全面展示了其政治上的发言权。

合同合作的影响

合同合作自1998年至2010年在英格兰全面实施以来,虽然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与英格兰在具体政策上存在一些差异,但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进程,有着一致的发展方向。^{①⑦}那么,合同合作的效果如何?从志愿组织来说,它获得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极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政府对第三部门(即政府和市场外的社会组织,在英国又常被称为志愿部门)的公共资助从2000年的80亿英镑增长到2008年的128亿英镑^{①⑧},NCVO将自工党选举以来的阶段看作是志愿部门所经历的最好的发展时期。过去10年中,非营利组织的增长率达到24%,快于私营部门9%和公营部门16%的增长率。^{①⑨}“2000年至2007年,慈善机构的收入从242亿英镑增长到333亿英镑。”^{②⑩}据NCVO《2010年公民社会年鉴》的统计数字,2007年至2008年,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共90万家,总收入1570亿英镑,带薪雇员数为160万人。调查表明,每年有2040万英国人参加志愿服务,他们提供了相当于120万专职人员、价值215亿英镑的工作量。^{②⑪}此外,志愿部门提供服务的范围突破了以往主要局限于特殊领域和填补公共供给不足的境况。根据社会服务监督委员会(CSCI)的统计,在1992年英格兰只有2%的家庭照顾时间是由独立部门提供的,而到2005年已经增长到73%。到2006年3月80%的注册家庭照顾机构都属于私人志愿部门。^{②⑫}

不过,志愿组织对政府的财政依赖也在不断增加。从下图可以看出,在2008年志愿组织收入的36%来自政

府,来自社会公众的收入是37%,而那些提供就业和培训服务的组织甚至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要依赖政府资助^{②⑬}。这意味着政府正在成为志愿慈善的最大投资者。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大约仅占慈善总收入的10%;1991年是27%^{②⑭}。



2008年志愿部门不同收入来源比例图

志愿组织对公共资金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其独立性,也招致了社会的批评。独立自主性是志愿组织依据环境调节自身的基础,但合同合作使志愿组织为了获得政府资助而进行的降低价格的竞争,使它们在一个实际不可能提供服务的层次中去竞标,或者将质量降低到满足服务的需要之下,从而对志愿组织的独立性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加之,政府成为志愿机构的主要资助来源,它可以自由地决定志愿组织提供服务的种类和水平;相反,志愿机构却必须提供购买者想要的服务。

从政府角度来说,志愿组织参与服务输送使政府额外获得了重要资源,减少了福利制度的花费。新工党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就业新政项目。以“青年新政”项目为例,政府宣称要让25万青年失业者脱离救济重返工作,为此财政部在第一次预算中就投资了35亿英镑,其中包括与志愿组织签订岗位合同,即,志愿组织为18-24岁的失业青年提供工作岗位,一旦新政参加者选择了志愿岗位,主导的志愿组织就必须负责管理和监督。^{②⑮}志愿组织通过合同合作参与到“青年新政”项目中,为失业者就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并为政府节约了大量开支。到2000年,英国失业救济的总体花费是70亿英镑(其中38亿英镑用于直接救济,32亿英镑用于失业政策支出),该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是591亿英镑^{②⑯},其所占份额已降至不足12%。到2005年,失业救济花费是38亿英镑,社会福利支出是780亿英镑^{②⑰};2010年这一数字分别是55亿英镑和1107亿英镑^{②⑱}。自1997年以来政府已经让两百多万人重返工作^{②⑲},失业救济在社会福利支出中的比重下降明显。而志愿领域的就业状况,则从侧面反映了其贡献。1995年至2000年间,志愿机构领域的就业率上升了

17.7% ,大大超过同期营利领域 8.5% 的增长率。^⑩“在 50 个雇员中就有一个是为慈善机构工作的 ,相当于为经济贡献了 35 万多个工作岗位和 50 亿英镑的 GDP。”^⑪

更重要的是 ,政府政策制定的权力得到一定程度的下放 ,志愿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力获得提升 ,大大增强了市民社会的活力。政府权力下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机构的调整。新工党政府设立了许多新机构 ,不仅扩大了“慈善委员会”这一专门管理机构的作用 ,而且创造了一整套新的部门。1997 年社会排斥署 (SEU)、战略交流署 (SCU) 和首相政策署 (PMPU) 相继建立 ,1998 年政府还建立绩效和革新小组 (PIU) ,2000 年 9 月创立儿童和青年署 (CYPU) ,2006 年成立第三部门办公室。这些新机构既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 ,密切了它们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 ,又使其得以管理这种参与。

权力下放还使志愿组织在与新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对第三部门的发展提出对策 ,营造了一种可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空间。这在 2008 年至 2009 年英国经济衰退带来的最初影响上有明显体现。鉴于对财政压力的恐惧 ,第三部门机构与政府代表召集了一系列“经济衰退峰会” ,以寻求政策上的回应。政府最终以“第三部门行动计划”(Third Sector Action Plan) 的建立作为回应 ,并许诺为第三部门额外提供 4200 万英镑的支持。^⑫在这种政策参与营造的良好空间下 ,志愿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开拓性努力 ,为自身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有力的政策 ,同时政府也通过与主导的第三部门机构确立的正式关系主动接洽 ,实现了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双向互动。

结 语

志愿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已成为英国社会福利的一个显著特点 ,英国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与志愿组织等的多元合作。合同合作的实现为英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第一 ,合同合作将志愿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 ,构建了一种新型伙伴关系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合同合作改变了社会对志愿组织的认知 ,进入福利国家时代志愿组织通常被看作是政府社会服务的补充角色 ,而如今则被看作是与政府平等的合作伙伴 ,这可谓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变动。尽管 COMPACT 描绘的只是一个极其初步的基本框架和模糊的原则性宣示 ,但新机构的创建及其政策空间的形成 ,极大促进了社会组织在政策讨论和政策规划中发挥的影响。它的实施和发展 ,必将落实到国家制度建设上来 ,也将关涉整个社

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因而 ,COMPACT 的签署迅速在英联邦国家产生反响。2001 年 12 月 ,“加拿大政府与志愿部门协议”签署。2010 年 3 月 17 日 ,澳大利亚政府和志愿组织在议会正式签署“全国性协议——携手合作”。合同合作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体现了这种新型伙伴关系发展的前瞻性。

第二 ,合同合作作为志愿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 ,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志愿组织的束缚。志愿组织历来被看作是是社会力量的代表 ,承担着对国家权力制衡和约束的责任 ,起着监督政治、促进公民社会发育的作用。这种将志愿组织与政治权力对立起来的思想源于英国慈善事业的社会起源 ,但合同合作使志愿组织成为政府政策制定与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不是社会力量政治发言权扩大的表现 ,也是新工党政府市民社会更新的一个重要成果。针对合同合作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种种弱点 ,2005 年志愿组织与内政部共同促进了 COMPACT 的修订版本——COMPACT PLUS——的出台;新协议更为简洁 ,原则更具有实践性 ,且加强了规则的约束力 ,从而使合同合作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到 2010 年 ,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已有 94% 的地方政府接受该原则并制定和签署了本地方的 COMPACT。^⑬

第三 ,合同合作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最早出现在英国 ,且推行的力度最大 ,这绝不是偶然的 ,它反映了社会福利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近年来 ,英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从政治体制之外来寻找合作者以解决社会与经济的痼疾 ,积极地倾听、采纳其他社会力量的建议。其中 ,提高公民责任、开拓与志愿组织的合作关系、推进社区发展被纳入政府发展战略之中。新工党政府希望以此重新焕发市民社会的活力 ,为福利制度的发展创造积极上进的社会环境 ,改变以往的消极索取的状况 ,进而解决福利危机。“英国人有一个特点——愿意自发为‘有益的事业’贡献力量。这种利他的行为习惯一直被视为英国文化的重要方面。”^⑭这正是新工党政府能够重进激发公民责任感和实现社会组织参与政治的源泉。与此同时 ,志愿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获取政治资源的发展途径。合同合作适时地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使二者在对立、妥协中获得了共生。英国不仅是第一个建立福利制度的国家 ,或许也将通过合同合作方式继续引领改革福利体制的世界潮流。

新工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不是要削弱福利制度 ,而是通过合同合作使公民和社会组织为福利提供更多的资源 ,实现福利的多元化 ,即 ,通过培养社会的互助达到有效利用社会资源、解决福利问题的目的。这也是政府权

力下放的目的。合同合作并非局限于一地一事,从而使这种新发展具有了全国层面的意义。第三部门的形成是21世纪英国特殊的政治推动力的结果,以志愿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救助体系第一次成为政府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与政府的社会救助体系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这是英国政治体系的一次重要调整,是自由主义改革传统在新形势下的一种体现。当然合同合作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政府资助与志愿组织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为其存在的隐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这次改革的成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将英国政府的努力看成是一种政府的福利投资,即将政府的资源提供给志愿组织而不是直接提供给民众,从而获得更大的福利回报。这一投资模式如果成功,将会对整个福利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论如何,任何一种变革都需要时间来检验,对这样一种涉及政府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制度安排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变化,并对它可能产生的长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学理上的评估。

- ① http://www.compactvoice.org.uk/sites/default/files/compact_1998.pdf 2017年2月21日。
- ②③ 陈晓律等《英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309-310页。
- ④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Polity Press, p. 124.
- ⑤ Roger Lohmann, *The Commons: New Perspectives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 Jossey - Bass Publishers, 1992, pp. 43 - 44.
- ⑥ Deankin Commission,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Voluntary Ac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NCVO, 1996.
- ⑦ 英格兰各地方不同领域合同合作的具体案例可参见英国框架协议之声(Compact Voice)网站, <http://www.compactvoice.org.uk/resources/case-studies> 2018年2月21日。
- ⑧ “Guidance on Developing Compacts”, *Scottish Executive*, 2006, pp. 10 - 12.
- ⑨ 尼古拉斯·迪金《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在英国社会福利中的协作伙伴关系》,《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7期。
- ⑩ Mark Lyons and Andrew Passey, “Need Public Policy Ignore the Third Sector? Government Policy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65, No. 3, 2006, p. 95.
- ⑪ Keith Hayton, “Scottish Compact Baseline Review”, *Scottish*

Executive Social Research, 2003, p. 5.

- ⑫⑬⑭⑮⑯ Steve Davies, *Government Policy, Recession and the Voluntary Sector*, UNISON, 2010, p. 7, p. 7, p. 19, p. 7, p. 19.
- ⑰⑱ 《卫报》高文兴译《小政府,大社会——英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公益时报》2012年3月27日。
- ⑲ 表格由本文作者绘制,数据来自2000年至2005年NSPCC年度报告及账目。
- ⑳ 丁开杰《英国志愿组织联盟与志愿者参与实践——以英格兰志愿组织理事会(NCVO)为例》,《理论月刊》2009年第3期。
- ㉑⑳⑳ Pete Alcock, “New Policy Spaces: The Impact of Devolution on Third Sector Policy in the UK”,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 46, 2012(2), p. 230, p. 224, p. 225.
- ㉒ Matthew Hilton and James McKay (ed.), *The Ages of Voluntarism: How We Got to the Big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3.
- ㉓ Nick Seddon, *Who Cares? How State Funding and Political Activism Change Charity*, Civita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 2007, p. 28.
- ㉔ Debra Morris, “Charities and the ‘New Deal’: Compact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nd Family Law*, Vol. 23, No. 1, 2001, p. 65.
- ㉕ http://www.ukpublicspending.co.uk/year_spending_2000UK_bn_15bc1n_4045#ukgs302 2018年2月22日。
- ㉖ http://www.ukpublicspending.co.uk/year_spending_2005UK_bn_15bc1n_4045#ukgs302 2018年2月22日。
- ㉗ http://www.ukpublicspending.co.uk/year_spending_2010UK_bn_15bc1n_40#ukgs302 2018年2月22日。
- ㉘ HM Treasury, Departmental Report 2005, London, 2005, Page of Preface.
- ㉙ 拉娜·福罗哈尔《非营利机构发展迅猛财源滚滚》,陈威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7期。
- ㉚ “A new manifesto”, *The Guardian*, 14 March 2001.
- ㉛ 贾西津《“伙伴关系”——英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启示》,《学会》2006年第6期。
- ㉜ 尼古拉斯·迪金《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在英国社会福利中的协作伙伴关系》,《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7期。

作者简介:周真真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姜守明)